



Lin Peng

林 鹏

湿地生态学、红树林专家。

1931年12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教授。率先对中国六省区红树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是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研究的开拓者。定位多年的生物量生产力研究,首次提示了红树林的“三高”特性(高生产率、高归还率、高分解率),为河口湿地水产养殖和红树林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首次将红树林优良种类跨5个纬度引种成功,并建立以潮滩、潮流、盐度为技术指标的造林选滩标准和以拐点温度作为红树种类抗寒性技术指标,对红树林北移造林选种和红树林恢复生态工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5项。出版著作18部。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是从事滨海湿地红树林和亚热带森林生态学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2001年我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国家和人民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和勉励。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人生历程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培养和老师的教导,以及同事的帮助和家庭的支持,当然也离不开个人的勤奋和刻苦,才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

1931年12月18日,我出生在福建省晋江县安海镇。当时我父亲在镇上的养正中学当体

育老师。安海镇外有一港湾叫“鹏江”,故把我取名为“鹏”。我一岁时,父亲带我们回到祖籍福建省龙岩县居住。他在龙岩师范学校当体育主任,随后的18年全家都在龙岩,我在那里念完了小学到高中。由于家里兄弟姊妹多,生活比较拮据,17岁时我辍了半年学,在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工,做些煮饭、扫地的活。后来得到亲友资助,得以念完高中。1950年8月,我高中毕业,想报考厦大,但到厦门考试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就放弃了。之后,当了挑夫,每天早上天没亮,我就和弟弟各挑着120斤重的盐担子到40公里外的白沙镇上去卖,卖完盐又买糖回龙岩卖,来回一趟3天。借此,挣得一点钱供家用。挑了近一年的担子,虽然很辛苦,但也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对我后来的工作生活很有益处。

一次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51年8月的一天,我在挑担累了,坐在龙岩的龙津桥头休息时,忽然眼前一亮,看见布告栏上贴着一张招生广告,当时厦门金门炮战,厦门大学理工学院搬迁到龙岩,要在当地补招30多名学生。我高兴极了,心想“得抓住这机会!”我当天就赶回了家取得家长的同意。于是,我考上了生物学系植物学专业。由于家境困难,成绩优异,大学4年期间全获甲等助学金。

在厦大,我有幸得到著名生态学家何景教授的教导。何景教授严谨的治学作风、对科学的执著追求精神、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苏北人,同学们起初听不懂他讲的话。我认真地做笔记,一堂课下来记了8页纸,不懂的地方就向老师请教。这样很快熟悉了老师的口音,而且知识也得到了深化。

1955年7月,我毕业分配留在本系任教。在何景教授带领下,我从事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生态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我相信勤能补拙的道理,每周前3天承担教学任务,后3天到离厦门130公里外的南靖县,走进亚热带雨林,进行

热带、亚热带植物的研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迫切需要橡胶。响应国家的号召,我和老师、同事配合全国华南热带作物科考队在闽南地区开展橡胶的抗寒研究。起初重点研究三叶橡胶,这种橡胶属热带树种,引种到福建生长不好,产量低,后来就开展亚热带当地种类花皮胶藤和亚热带森林群落的研究。回忆那一时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甚至住破庙席地而睡,非常艰苦,可这却让我练就了强健的身体,还增强了探索科学的毅力。

我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研究比较多一些。有的记者写我是红树林研究权威,这是对我的褒奖和溢美之词。不过,多年的研究,我确实热爱红树林研究这项工作。

红树林是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因为生长在海岸,周期性遭受海水浸淹,所以红树林又被称作“海滩森林”、“海底森林”。红树林能保护堤坝,减轻风暴浪潮灾害,消降海洋河口污染。红树木材可用于造船、造纸,幼枝嫩叶可作饲料、绿肥,果实可食用,有的可制香料、药物,还可用来鞣革。红树林区是鱼虾蟹繁生的饵料基地,可发展渔业和海水养殖业。近年来,红树林海岸还被开辟为环境教育和观光旅游胜地。红树林对保持生态平衡、维护人类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我国是个红树林大国,但是国际上长期以来有人认为我国已无红树林的分布,例如1977年出版的《全球生态系统 I 湿地海岸生态系统》一书就把中国红树林除台湾外列为空白。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早在50年代,我国的红树林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如何景、汪德耀、张宏达等人的重视,先后开展了一些研究。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彻底纠正这种错误认识。

1953年,我跟着何景教授第一次踏入红树林滨海泥滩,参加了红树林群落的调查和照相,为何景教授出版第一篇中国《红树林的生态学》论文提供了科学素材和照片,从此我步入了探

索与研究红树林的科学殿堂。

1980年我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应邀参加美国西部自然科学家学会主办的“第二届国际红树林生物学和管理及热带浅水群落学术会议”。这个会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召开。我在会上做了中国红树林研究的学术报告。会议主席评论该报告纠正了国际上认为“中国已无红树林”的错误看法。那时研究经费不足,实验条件简陋。我想,要彻底改变国际上对我国红树林的不正确认识,必须把这项工作做深入。我带领科研小组走遍闽、浙、两广和海南诸省的全部主要红树林区,寒来暑去,有车搭车,无车徒步,而且常在没膝深的滩涂中跋涉。经多年努力,终于系统、完整、准确地获得了有关红树林的第一手资料。1985年5月,我参加在澳大利亚海洋研究所举行的一个国际红树林会议,在向大会介绍完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后,会议大厅发出热烈的掌声,会议执行主席、著名的红树林专家费尔德教授拉住我的手,连声说:“你的报告非常好!非常好!”这一研究成果打破了“中国除台湾外没有红树林”的偏见,使国际学术界改变了对中国大陆红树林及其研究的不正确认识。

25年来,我走遍中国红树林分布区(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全面深入调查并选择在三个典型的群落开展红树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究,对我国红树林的种类、区系分布,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先后出版了中、英文版专著各2部,论文两百多篇,论文集6集。尽管感觉很忙、很辛苦,但科研工作中也充满了探索发现的乐趣,特别是看到通过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做了一点有益的事时,我感到很欣慰。我曾经为了保护一片6000多亩的红树林湿地免遭破坏,提出取消围垦,由此受到指责。有人署名“一群群众”写信攻击我,并且四处散发。还写信扬言,要来100个人到我家门前静坐,到我家吃饭,不收回反对意见他们就不回家。我觉得维护保护区不

受破坏、保护环境是多么重要,不理解的人以后会慢慢理解的。我坚持建议,说明红树林对环境的重要性,终于得到福建省人大的支持,取消了该湿地的围垦。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了一项基本国策,红树林的保护和生态恢复将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对于我这个研究红树林、热爱红树林的人来说,又是一个鼓舞。

此外,近30年来我还从事自然保护区科研工作,深入福建武夷山、梅花山和戴云山、闽江源等10个保护区,开展生物资源科学考察和编写科考报告,为保护区的资源保护与研究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及坚实的基础理论,其中7个保护区在最近六年来先后提升为国家级保护区。这些考察必须爬山越岭,风雨无阻,年轻时挑担子练就的体魄这时发挥了作用。有时没地方住,就住破庙,有时在荆棘丛中走着走着,一不小心会陷入山上农民狩猎的“老虎坑”或跌落谷地。

1987年,我带队开展福建省梅花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在从上杭县回龙岩市的途中发生车祸。造成除左手外,三肢受残(左上、下腿粉碎性骨折,右脚脱臼,右手断裂),当时被县交警判定死亡,2小时后,地区交警复查时,被推动才苏醒过来。有人说“林鹏将残废,难于继续开展喜爱和执著的工作”。经1年半的住院治疗,动了6次手术,在同志们的关心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我终于又站了起来。出院之后,克服了车祸造成的身体局限,继续开展上山下海的各项教学科研工作。

1961年11月我从助教被提升为讲师,1981年4月提升副教授,1986年6月评上博士生导师,1986年8月评上教授,2001年11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每一次的成长,除了感谢国家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外,我都会想起恩师——何景教授,他在我人生路上的引导和教育,使我在做人 与 做学问上健康成长,我终生怀

念他。

至今,大学毕业已50多年了。回顾我这半辈子的工作和人生经历,我想有以下几点体会与年轻朋友们共勉:

一、人生路上要抓住机遇,把握转折。有这样一个故事,老师以“机遇”命题作画。学生甲画了“鱼儿在游,一个人在垂钓”;乙画了“鸟儿在树上,一个人欲打之”;丙画了“一个人迎面跑了过来,前头有一小撮头发如‘三毛’样,后面无发也无辫”。结果,丙画的是最佳答案。这个故事说明当机遇来到面前时,关键是能否抓住。我在人生道路上,青年时抓住了上大学和跟好老师做好学问这两个机遇。

现在大学生和研究生出国学习、学者出去访问的机会很多,这可以开阔视野,更便利地学习国外的新成果,一定要非常珍惜。我曾经有一次留学机会,学校拟公派去美留学,因工作需要离不开,没有去成。在国内扎扎实实地做研究,也一定会做出成果来。近年来,国内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当然,经常走出国门与外界交流是必要的。

二、专业学习上,多读书,读活一本书,不可尽信书。读透一本书,弄通基本概念,才能博览群书,才能有学科间的交叉和融会贯通,好比人们交谈,要有共同语言,才有交流的基础和相互弥补提升。不迷信书,但要精读一本书,才有客观判断标准,然后才能对比性地批判吸收其他书的长处。处理好死记硬背与活学活用关系,有些东西确实需要先记住,然后应用。记得中学时化学老师要求我们背诵化学元素外文名词时,大家很不乐意背。我背了,后来搞科研看外文书流畅多了,觉得很好用,不用再一个一个去查,它就装在我脑子里。

尊敬导师,但不迷信权威。例如,我精读何景教授的《植物生态学》,又对比其他作者的同类书籍,分辨正确与错误,取长补短。

三、学术研究上要严谨求实、矢志不渝。科研需要常年甚至终生累积方才有所创新,切

勿朝三暮四,觉得哪个专业“吃香”或较容易出成果就改行,最后什么都没有研究好。实际上没有容易出成果的专业,任何专业都有它的特点和艰巨性。我开展红树林研究,从分类、形态、群落学的研究直至生态系统能量流、物质流,对鸟群、底栖生物、水生生物各子系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深深体会到科研工作的系统性、艰巨性。科学资料靠累积,只有深入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我对秋茄红树林的凋落物的研究就做了连续 11 年的跟踪观察。我的科学方向是植物生态、红树林,我这一辈子都是在搞这方面的研究。上世纪 80 年代初,有人要求我改做“植物化学”,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没有改动研究方向。我总结自己“方向明,干劲大,及时总结”,即找准研究方向,定下心来,认真学习,扎实工作,为社会多作贡献,研究成果要及时总结、发表、成书,不草率、不积压。

治学力求准确。修改稿件、论文,一句一言推敲,以求尽善,修改再三,方可投稿、付梓。例如,我讲授“植物群落学”课,讲了十多年,讲课中开展课堂点评并请学生参与讨论,找出缺点,经反复修改才出版。出版后,希望学生深入钻研,再做修改和纠正,以免贻误他人。

四、不怕艰苦,勇攀高峰。对科学事业不仅要献智慧,要有决心与毅力,不怕流汗,还要

不怕流血。生态科学有不少野外工作,常要上山下海,风餐露宿,在没膝淤泥中工作,有时被贝壳刺伤。1959 年至 1960 年间,我带队在福建调查热带作物橡胶宜林地,妻子分娩无人照顾也没顾得回家,做到了公而忘私。1987 年那次车祸,真的差点要了我的命。

五、敢于挑战权威,勇挑重担。在红树林的研究上,敢于挑战权威,做出了自己的成果,打破了洋权威的偏见。我刚毕业三年时,就带领三个大学组成的 70 多人的福建省植物资源调查队,进行资源普查。当助教第 5 年时,就带一个华南综合科考队福建分队进行热带作物宜林地考察工作。

还有要说的是,品德的修养很重要。要有为祖国争光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我的体会是以“刚毅诚信”待人处事,“顺境要谦虚,逆境要自强”。几十年来,顺境多,逆境也不少,经历阳光风霜雨露,锻炼了一身“开朗、豁达、刚毅、奋进”的精神。我觉得,红树林的生物学特性象征着一种精神:“发展自己,造福别人”、“抗风暴、除污浊、造福人类”,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的名言:科学道路是崎岖的,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不断攀登的人,才会到达科学的顶峰,与大家共勉。